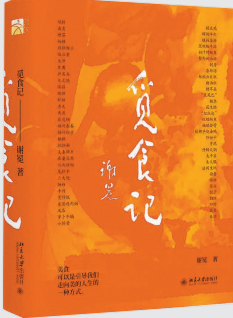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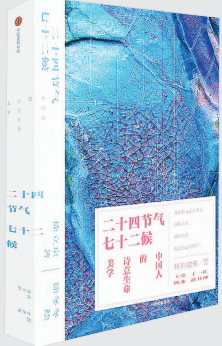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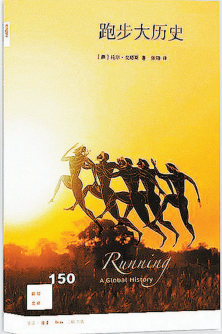
收入北大学者谢冕的美食文字近30篇。谢冕笔下的美食文字，记略了因美食而遇到的人和事，耐读的同时，多了人生的滋味，淡然而不乏丰满。

《觅食记》
谢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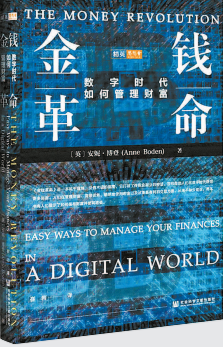
这是第一本用中国抽象绘画的“语言”来描述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亲近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的书。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徐立京 著 徐冬冬 绘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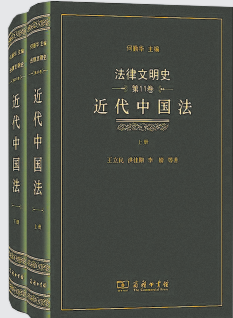
不仅涵盖跑步现象的文化和历史范围，还涵盖了它的哲学。跑步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自古以来人们进行这项疲惫痛苦却又令人振奋的活动的诸多原因和方式。

《跑步大历史》
[挪]托尔·戈塔斯 著
张翎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1月出版



人们在管理财富、清理债务、精明地使用现金以及从事最有利的交易方面，从来不缺建议。本书展示了如何在数字时代保有财富并使其增值的方法。

《金钱革命：数字时代如何管理财富》
[美]安妮·博登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系统展现了近代中国在风云诡谲历史大变局下法律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探讨近代中国传统法制的衰落与“西法东渐”、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法律文明史（第11卷）：近代中国法》
王立民 洪佳期 李婧等著
商务印书馆
2022年1月出版

书人茶话

考古学在中国：从田野走向大众

唐骋华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考古学界的纪念活动一波接一波，着实热闹。学术圈外，公众的目光也一再被考古新发现所吸引。无论是三星堆“上新”，还是国家文物局确认汉文帝霸陵的位置，抑或洛阳惊现唐代太平公主宅邸，都频频登上“热搜”。加上2021年底央视热播的跨年度文化类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让人感到考古这一原本高冷的领域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正从小众走向大众。

被历史热冷落的考古学

如果从2004年央视“百家讲坛”开播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算起，“历史热”已持续近20年。根据“开卷”对图书零售市场的监测数据，在学术文化类图书中历史书常年稳居第一，不仅每年有畅销书出版，也不乏表现稳定的长销书。这背后，是公众对历史的浓厚兴趣。

可公众的兴趣点往往和学术发展严重脱节。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就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把“纸上之文献”和“地下之新材料”相互验证，得出可靠结论。王国维所说“地下之新材料”，指考古发掘的各类文物，这便将考古学和历史学紧密地连接起来。从此，研究中国历史就离不开考古学。试想，如果未曾发现安阳殷墟，今人何以认识商王朝？

遗憾的是，在方兴未艾的历史热中，考古学长期缺位。这也难怪，历史可当故事甚至段子来讲，政治斗争、军事谋略、深宫八卦，总能激起读者的肾上腺素。可有几人能把考古报告故事化，绘声绘色地讲给外行听？

看起来，考古学注定远离日常生活。其实未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兴起一波学术大众化运动，知名学者纷纷走出象牙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公众讲解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高冷学科”。公共考古学也在此期间应运而生。它可分成两个层面。首先自然是要求考古学家打破专业壁垒，用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传播考古学知识，分享考古学进展。但这并非简单的“我教你学”。公共考古学概念的提出者、美国考古学家麦克基西西更强调调动普通人的能动性，让他们和考古学家共同推进研究、保护文明遗址。这对于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麦克基西西的主张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人对庞贝古城、特洛伊古城等古希腊-罗马遗址的发掘。西方由此确认“两希”（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的辉煌，并指认其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从而建构起一条绵延数千年的文化脉络。

中国考古学走过的道路与之相似。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西莫尔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挖下“第一铲”，仰韶文化浮出水面，西方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终结。更重要的是，



同行的中国学者由此掌握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而改变了中国只有金石学，没有现代考古学的现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仰韶遗址的发掘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1928年，李济、董作宾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主持发掘安阳殷墟，并确认它就是商王朝最后一个都城“大邑商”所在地。1959年启动的偃师二里头考古项目，则被认为最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夏王朝。本世纪初上马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实证工作。

及至今日，历经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已取得飞跃式进展。只可惜学术成果虽丰，却始终存在着公众认知度不够、参与度有限的问题。多数时候，热闹只在小圈子里，很难进入公众视野。

唯独岳南例外。自从1990年创作《风雪定陵》以来，岳南踏勘考古遗址、寻访考古学者，撰写了几部考古类图书。2021年底，他还推出两卷本《岳南大中华史》，用历史与考古新发现相融合的方式，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中华文明的演变史。应当说，这是对公共考古学很好的实践。不过，岳南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人们期待真正的考古学家能“降临人间”。

“考古明星”推动考古类图书“井喷”

2016年，原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许宏出版《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此后，他又相继推出《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以及《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形成“解读早期中国”系列。和一般的学者不同，许宏语言生动、思路清晰，其著作即便“考古小白”也能读懂。他还入驻各大新媒体平台，登上“一席”“十三邀”等文化类节目，呈现考古魅力，收获大批粉丝。

接受媒体采访时，许宏从不讳言自己“让考古从田野走向大众”的初心。

“历史热”持续多年不断，曾经备受冷落的考古学迎来“小阳春”，相关图书的出版甚至出现“井喷”现象。



时至今日，他无疑是中国考古界的“头部网红”。

许宏开了个好头，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放下身段，投身公共考古学。这又呼应了市场需求。尽管学院派一直对所谓的历史热表示不屑，但它确实“养刁”了一批人，使他们不再满足于某朝那些事之类的讲述，而是渴望接触更多干货、更具品质的历史叙述。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年轻人，迫切地想了解中华文明从何而来，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又将往何处去，他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考古学。

备受冷落的考古学于是迎来“小阳春”。反映到图书市场上，就是近些年考古类图书颇受欢迎，甚至呈现出“井喷”迹象。例如，2016年专家公布海昏侯墓考古成果、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都掀起了相关图书的出版潮。2021年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挖掘成果，更是直接带热了考古类书籍。据统计，各大网络购书平台上有关“三星堆”“考古”“文物”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短时间内暴增360倍。

2021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活动一波接一波。令人欣喜的是，此次考古界没有待在舒适区，而是力图“破圈”，吸引受众。86岁高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术考古奠基人杨泓，出版了《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用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方式，勾勒出中国考古百年来的发展轨迹。这本书被读者誉为“纸上国博”。

新年的钟声刚敲响，中信出版社更是推出《考古中国：15位考古学家说上下五千年》一书。作者除了颇具影响力的原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许宏，还包括原殷墟考古队长唐际根、良渚水利系统考古领队王宁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等。就学术水平而言，这些人足以组建一支“考古学天团”了。内容也很扎实。该书精选14处大遗址，请考古学家精讲。所谓“大遗址”，指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

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和遗址群，如良渚遗址、秦始皇陵、海昏侯墓、清平堡遗址等。许宏还撰写了长篇导言《考古中国，唤回我们的文化记忆》，介绍中国考古学的来龙去脉，并对14个大遗址给出了一个整体性的理解框架。

许宏将古代中华文明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距今5500—3800年为邦国时代，出现仰韶、良渚等上古文明，它们如满天星斗散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公元前2000年左右邦国急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二里头、殷墟和三星堆为代表的广域王权国家，满天星斗变成月明星稀，王国时代拉开帷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标志着中国进入帝国时代。从此大一统政权如凌空皓月，笼罩中华大地两千多年。

经过梳理，中华文明的演变脉络清晰了许多。这对于读者的把握和理解非常友好。紧接着就是各位考古学家针对不同遗址进行拆解，过程同样有料、有趣。可以说，《考古中国》体现了学者在公共考古学方面的努力。

在全球视野中了解中华文明

许宏在导言中的一句话令我颇受触动：“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意思是，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曾自外于世界，而一直是汲取其他文明体先进要素的基础上扬弃、创新，生发出自身特色。例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长身战斧和环首刀，就受到欧亚草原青铜兵器影响。这说明，中原腹地和欧亚草原很早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正是在碰撞与裂变中孕育出了璀璨的商周青铜文明。唐代对外来文明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更是众所周知。

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就不能局限于东亚区域，而应当具备全球视野。

那么具体到考古领域，有什么入门书吗？长久以来，我喜欢推荐德国学者C.W.策拉姆的《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该书围绕古文明遗址，揭示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美洲文明的基本面貌。由于作者策拉姆是记者出身，叙事能力一流，又善于制造悬念，让阅读变得十分享受。该书的问题在于出版年代较早，不少知识需要更新。

所幸随着考古类图书井喷，相关译著也多了起来。美国学者埃里克·H.克莱因的《考古学故事》、英国学者保罗·巴恩的《考古通史》，都融入考古学新成果，揭秘全球重大考古遗址。如想进一步窥探考古学动态和进展，则首推英国学者科林·伦福儒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该书不断推新版，是目前了解世界考古学发展最权威、最全面的著作。

当我们对考古学发展，以及各大文明遗址都具备一定的认知后，回过头思考自己的文明，相信会有新的体悟。这也是公共考古学所追求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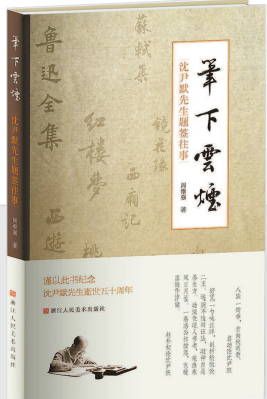
世人可知晏阳初？

周维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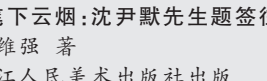
书中两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一是晏阳初对张学良威逼利诱的拒绝。张学良对晏阳初有知遇之恩，这很容易变成人身依附，但晏阳初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也让他的平民教育运动没有沦为政治之术，而是救国之道。作者处理这个细节，没有过分强调其品行高洁，而是突出了笃定务实，更体现出晏阳初的人格特点。唯如此，晏阳初才能在战乱纷争的近代中国坚持下去。另一是晏阳初在定县实验时遭遇的问题。作者对定县实验的描写，回到乡村社会改造的语境，写出了实验中各项工作间的逻辑关系。比如，尽管棉花产量不高，但农民仍不愿改变种子，这就需要通过试验田的方式让农民信服；棉花丰收了，农民却因不能决定价格而难以真正受益，这就需要建立农产品销售渠道。如果没有基层的社会工作经历，就很难讲清晏阳初在定县开展的一系列实验。但作者在处理此类细节时，显得格外得心应手。

《晏阳初》值得推荐的优良还有很多，在比较各种晏阳初传记的基础上，我特别介绍这两点。其余部分，留给读者自行品味。

三味书屋



《鲁迅全集》
周作人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笔下云烟：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
周维强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大约在三年之前，我收到周维强先生的微信，他引了一段张宗祥先生1960年写给在香港的侄子金申禄的信：“尹默极好友。我字与彼，彼用功，我天资高，各有长处。彼既一帧售50元，我亦不可过高，至多高二成。画可随便定，但亦不能过老友黄宾虹，照黄宾虹例，或减二成可也。”接着他提出两个角度颇为特别的问题：“张宗祥先生提到的售价是港币还是人民币？书画售卖行为是发生在香港还是内地？”这段材料信息量很大，我一下子来了兴致，在私人通信的场合，张宗祥先生对沈尹默和黄宾虹的评价、对自我的定位耐人寻味。60多年过去了，这番评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依然值得细观审视：张宗祥1960年尚有订润格的做法，那些在民国时期依靠艺术市场售卖作品为生的艺术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生活情形如何？又翻阅王中秀主编的《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虽未找到能直接回答关于“币种”问题的答案，但由此对润格相关的史料开始留意起来。

后来才得知周维强在写与沈尹默有关的“小文章”。收到他的新书《笔下云烟：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他口中的“小文章”！

沈尹默在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书法普及工作，为图书题签是这些普及工作的内容之一。他在《书法的今天和明天》一文中讲过：“书法本来不仅仅用在条屏、对联、册页、扇面上的，就是广告商标、路牌、肆招、标语、题签、题画之类，也需要有美丽的书法，引起一定的宣传作用。我历年来为书籍图片出版社以及日用商品店、出口物资公司等处题了不少字……这也是社会上需要书法的一个绝好的实例。”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为书法的命运担忧的声音，他一方面通过撰文阐明书法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身体力行，让自己的书法为满足大众的生活和审美的需要而服务。

20世纪50年代，由吴玉章牵头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开始着手制定文字改革方案，推行简化字。自此，有关繁体字与简体字之间的争论就未停息过。1963年底，沈尹默发表《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认为书法发展规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结合实用，因此书法艺术家没有理由反对简化字，而要拍手欢迎，这不仅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书法艺术界取得“突破”的大好时机。在书法形体的处理上不能追求“端庄、大方、生动、健康的美，而要追求怪异”。这实际上就为这一时期的书法提出了一个如何为大众服务的美学标准，也为个人书写如何与新时期互动提供了一个样本。缘于此，这一时期他题签的数量很多。题签时，他的书写状态在情绪准备上是饱满的，积极的，思想上的准备也是非常充分的。这些题签，应视为沈尹默晚年书写观念和书法探索的重要书法作品。

然而题签确实是一种在形制上较为特殊的书法形态。题签由起分帖、标记作用的标签演化而来，逐渐演化为书籍、书画装裱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用功能外又增艺术性的考量。到明清时代，题签的形态已极为丰富，其文化艺术功能亦在这块小小方寸之地展现到了极致。题签文字不仅可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来欣赏，亦可作为书画流转过程、文人交游往来之见证。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亦能见证社会文化审美习惯的变迁，传达某些特殊的政治意涵。因此，一方小小的题签，不仅能见证书法家的艺术创造

「观其下笔处」

唐卫萍

能力，同样也能见证历史。

周维强以题签背后的“往事”切入，在选题上可谓独具心眼。全书25则随笔，以题签为生发点勾连出沈尹默的人生经历、人品、诗文、书风、交游等，看似信笔写出，但前后映带紧密，显现出作者剪裁史料的匠心，一个完整的沈尹默的剪影呈现出来。

就我的了解所及，该书应该是国内第一本专门汇集并讨论沈尹默题签的著作。其中使用的材料，不仅包含已公开出版的题签，还包括部分未被出版社“选中”、因而未能进入大众视野的题签。

作者对史料非常敏感，常有独得之见。比如沈尹默为出版社写题签所收稿酬之材料，铺陈相当精彩，读者自可循章阅读。

书中亦有闲笔，于文献之难以实证处，以心证通之。比如作者提到：“沈尹默先生后来确实很少撰著古典文学论文了。那么，他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要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题写书名的同时，会不会也借此在心底里重温着这些作品的意味呢？他在写书名时会不会也在沉潜涵泳着这些古典的精华呢？”稍稍了解沈尹默治学和人生经历，读到这里多有会心之感。沈尹默早年在北大讲授文史课程，作为诗人的沈尹默在题写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诸人之诗集时，所听所感恐怕是不能平静的。尤其是他还深受目力衰微之苦，不能多阅书报，晚年更甚。作者的发问为我们体会和理解沈尹默题签时的书写状态留下了想象空间。

尽管沈尹默在书法上的名声远远盖过其诗名，但作为书法家的沈尹默与作为文学家的沈尹默何尝分裂过？当然不能割裂来看。书中有很多类似闲笔，有含蓄蕴藉之致，在我看来都是作者引而未发的部分，也是感到意犹未尽的部分。

沈尹默曾自述其平生笃信米芾“惜无索靖真迹，观其下笔处”，尤其是“下笔”极为关键，乃是书家“金针度”之处。学术随笔、学术掌故类写作同样也是如此，下笔发端处极为可观，立意高下亦从此处殊分。本书固然有题签书法欣赏，而更着重在题签背后的历史掌故。全书取材却颇为“平淡”，无一般写掌故之猎奇手笔，亦不贩卖所谓“秘辛”，写法上以随笔出之，虽有旁逸斜出之枝，然下判断处落笔谨慎，小心求证。比如关于润格问题，对高罗佩《巴江录别诗书画册》、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等题签的辨析，把尚有讨论空间的学术问题摆在了读者面前，这恐怕是进一步研究沈尹默题签书法很难绕过的话题。

有考证、有发问、亦有感怀，再加上作者精心选择的史料，本书的写作兼具学术与随笔写作的特点。作者手里拿着一块瓦片，投掷出去，击打出无数的火花。沈尹默的文化形象和个人形象在这些四溅的水花当中变得生动起来。

2021年是沈尹默先生去世50周年，我手头正好收有一本钟明善先生2015年编著的《小题“大做”：于右任题书法作品欣赏》，也是为纪念于右任先生去世50周年所作。“南沈北于”，两座高峰，两条书学道路，在被历史化的道路上重新“相遇”，将两本题签对观，竟似生出见证两位老友重逢的幻觉。